

2023年10月18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王玺
校对:马晴春

丁家坊社区办公楼

地名记忆

丁家坊 一个社区的源远流长

文志勇

只要是醴陵人,不知晓“千年醴陵县,万年咯丁家坊”这句民间俗语的还真不多。

丁家坊是位于醴陵市城区来龙门街道办事处东南部的一个社区,北倚秀美的人形山,南临悠悠渌江河,地方不大,面积只有3.2平方公里,人口却有8000余人。

丁家坊历史悠久,据说其得名比醴陵古城设置还要早,所以“万年咯丁家坊”的说法也喻指其存在年代久远。民国版《醴陵县志》载:丁家坊在宋、元年代属醴陵乡依仁里,明代属上坊都,清代属十五自治区之城区,民国年间先后属旧五区之一区、清泉乡之第五保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归属于渌江乡、城东街道办事处和来龙门街道办事处等。2005年,丁家坊由村转为社区委员会,辖15个居民小组。2016年,新一轮行政区划调整,上洲村与丁家坊社区合并为一个社区,仍称丁家坊社区。

丁家坊得名,据传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有丁姓在洲上聚族而居,沿河岸设堤坊(古“坊”同“防”)以防洪护洲,故名丁家坊。丁家坊老辈人讲,这里在晋朝置的旧永久牌自行车,风尘仆仆地来来往往,那辆自行车因为生锈而发出特有的铃声,总是每天提醒我的黎明。

我曾经有两次坐公交车去找父亲,有次中途车在清水塘站提前下车,路边那泛着清波长满菱角的水塘里有满眼的嫩绿。父亲上班的地点必须经过清水塘再往前到水泥厂,是9路公交车的终点站。水泥厂里到处都是厚厚的灰尘,当时他戴着纱布口罩,顶着一头“灰白的头发”,见过我后,就匆匆走了“车回”。

不上班的周末,父亲会将时间安排得非常充实。那时每家每户都配发粮证、煤证、布票、肉票、粉丝票、豆制品票……父亲是一家之主,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父亲口袋里揣着这些票证,盘算着家庭成员的温饱。我随着他先后进粮店、菜店排队购物,然后再跟在他的身后扛着长长的水勺去菜地浇水,摘辣椒南瓜,挖成熟的芋头。那个时候我偶尔偷懒,会趁着蜻蜓正在竹篱笆的丝瓜架上歇息,屏住气息去捉住,然后又将它们放进松散的粪筐里。

为了解决好温饱问题,父亲自己挑砖砌了一口带宽灶的土灶,做饭的同时可以烧好热水,我放学后也会经常去厂里的木工房找剩余的刨木花等废料做柴火。我

记载,丁家坊在明代洪武元年曾称为新洲,历时400年历史才更复为现名。丁家坊原先的管辖范围很广,新中国成立前上洲、中洲、下洲三村(地)均在其境内,东至黄沙兰家坝,西南至桂花桥、巫家湾地段(现湘东医院一带)。新中国成立后,下洲逐渐演变为名为烈士塔,成为醴陵老城最为繁华地段,已不复为丁家坊管辖之地了。只有中洲仍在丁家坊境内。

自古以来,丁家坊就是一处举足轻重的交通要道。明清及民国年间,县城由东走丁家坊,为出入浏阳驿道。原驿道只有两三米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通106国道之前,从县城通往东乡的主道,就是从丁家坊出发,沿渌江河岸经马脑潭(不经过珊瑚)直达黄沙的。丁家坊水运尤为发达,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都繁盛一时。村南廖家渡口,原为复兴码头,兴建于清嘉庆年间,为醴陵三大古码头最为繁忙热闹处。码头对岸即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醴陵颇负盛名的国有企业涑电和永盛瓷厂。在陆运欠发达的时代,这个码头便是醴陵瓷器和其他货物进出的主要转运站。现码头遗址保存较好,青石板路及码头立碑还清晰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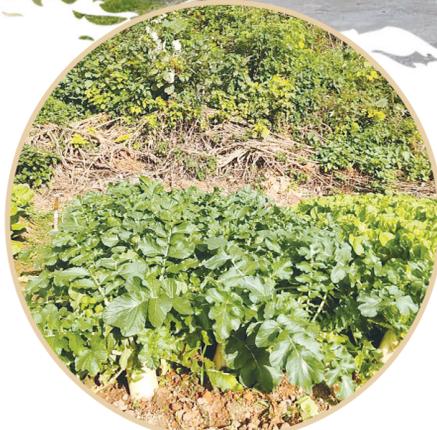
丁家坊村民一直以种植蔬菜和稻谷为生,也贩卖些豆腐香干。这里的土壤沙性重,土地肥沃,村民种植的萝卜曾名重一时。丁家

坊俗称的沙罐萝卜品名其实叫“浙大团”,是从沿海省份引进的一种良种萝卜,种植始于民国早中期,个儿又长又大,水多汁浓,每个萝卜最小的都有3斤,最大的曾达到十三斤重,易腐烂,脆甜可口,成为醴陵当时著名的土特产品,与曾作为贡品的黄沙庄埠芋头齐名,远销株洲、湘潭和萍乡等地。

丁家坊萝卜在人民公社大干集体时,种植面积一度达到200多亩,亩产萝卜近5吨,为当时的大队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丁家坊却常受水患洪灾之扰,庄稼等农作物年年失收歉收成为家常便饭,导致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地方群众生活困难。当时有一首民谣唱道:“有女不嫁丁家坊,又怕大水又怕干……”在旧社会,丁家坊人民的生活是日保日、餐保餐,常常是吃零米过日子,等卖完蔬菜香干后才换点早米饭回来下锅。

历经几十年变化,丁家坊现已成为城区的一部分,浙赣复线、320国道穿境而过,连栋成排的房产如雨春笋般拔地而起,村内工商业发达,百业兴旺,村民大多住上了漂亮舒适的楼房或别墅,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万多元,人人都过上了富足美满的幸福生活,再也不用靠天吃饭,男人们也不用发愁讨不上媳妇了。

这就是丁家坊,一个古老厚重而又日新月异的美丽村庄。



丁家坊栽种的沙罐萝卜



丁家坊村南的廖家渡口,当时为醴陵三大古码头最为繁忙热闹处

现在,丁家坊的村民大多住上了漂亮舒适的楼房或别墅

老照片



1985年5月17日,株洲市公安局干警会操检阅仪式,前排检阅三人组中居者为时任株洲市政法委书记万晓阳

晓阳书记

刘云波

这是父亲留下的一张老照片,背面有他的笔迹:“1985年5月17日,市公安局干警会操检阅。”这也是株洲市公安局全体干警着装的第一次大型阅警式,市局所属的各部门单位、各警种方队成一字排列,以抖擞的精神面貌接受市领导检阅。

建国之初至1980年,除基层派出所民警、交通警察、消防警察、武装警察以外,其余公安干部一律不着制式警服,1970年代末,着装范围逐步扩展至市县的刑拘、预审部门,最后才扩大到全员着装。这次阅警也是检验当时全局民警着警会操成果的一个结业仪式。

那次会操的主检阅领导为时任市委副书记郝诚和市政法委书记万晓阳,由市公安局局长刘辉陪同。芳华转瞬,他们都已离开了人世。作为新中国公安政法战线第一批生力军,他们那辈人的青春年华似火一般炽热。郝书记或无缘接触,这里我要说的是万晓阳书记。我那时在南区公安分局办公室工作,因此与他有过接触,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真诚,平等待人,丝毫没有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官架子,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普通人。

1990年代初,我担任市南区公安分局办公室主任,在分局领导的鼓励下,创办了一个带有文学性质的期刊《警营风采》。为了提高刊物在全市政法系统的知名度,我冒冒失失地赶到市委所在地,找到时任市政法委书记的万晓阳,请他题写刊名。他不摆架子,没有推脱,只说自己很多年没有摸过毛笔了,叫我隔天来拿。他顺便问了我一下分局当前的工作情况,问得很细,不时在本子上记录我所说的数据和情况,不断轻声细语地催我,也知无不言地向他如实汇报。说着说着就到了午饭时间,当时我根本没有考虑会影响万书记的午休,也没有考虑自己与他的地位悬殊。他叫我留下吃饭,我也就傻乎乎地跟了。他到机关食堂打来饭菜,将搪瓷碗碗放到壁炉上,边吃边谈,一直等我讲完情况说完。

几天后,我赶到万书记的办公室,拿到他题写的刊名,是那种很古法的隶书,书写遒劲有力,笔墨饱满,字距均匀,可以看出是习过古帖的童子功。后来与他交往多了,知道他教过私塾,是一位有文化底蕴的领导。

万书记是80年代初湘潭地区撤地并市调到株洲市来的,当年我父亲在市公安局工作,之后又到人大负责依法治市工作,他们在工作中有许多交集。1984年,正是“严打”工作引向深入之时,他们常在一起工作,并肩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结下了深厚的工作感情。时值机构改革之初,省里有关部门的个别领导以我父亲文凭低为由,要他退居二线,是万书记及市里的主要领导力挺和坚持,才使我父亲得以继续为党的公安事业工作。我想万书记他们为父亲出面讲话,并非出于单纯私谊,而是出于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诚,对身边同志的了解,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的精神。

万书记对青年干部的培养也是不遗余力的。我听他讲过一段往事,那年,浏阳县城发生了系列盗窃案,一直破不了,搞得人心惶惶,县委书记找到已担任县委副书记的他,请他挂帅破案。他临时找了几个,其中有省农学院刚毕业的青年小刘,那位刘同志出身贫苦的寒酸家庭,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是农民,俗称半边户,人聪明勤奋。万书记带临时组成的6人专案组,冷静地分析案情,一步一步,不断地发掘出新的线索,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工作,终于找到关键证据,一举破获县城的系列盗窃案件,在浏阳一时传为佳话。

1980年代初,万书记调到株洲任职后,向我父亲推荐了已在株洲市局机关工作的当年那位刘姓年轻人。这位年轻的大学生从市局刑侦大队的秘书股长一路成长,最后官拜局长。

万书记退休后,我们在私人场合见面机会更多,交谈也更轻松。父亲去世后,他每次碰到我,都要问我母亲的情况,身体状况怎么样?有什么病,吃什么药。非常唏嘘和我父亲在一起的往日时光。别人请他钓鱼,我曾陪过两次。那年在大高水库,我们坐在池塘边聊天,谈及往事的闲谈中我问他,你退休后,那个曾经受过你恩泽的人来看过你吗?他说:“没有啊,一次也没有!”说完笑着反问我:“你什么意思哦。”两人说着说着,都笑了。

我知道那个年代的干部是不徇私情的,凭实绩用干部是基本原则。父亲常跟人说株洲政法系统领导写文章讲话,万书记的逻辑性强,文笔出色,讲话稍作整理就可直接当做会议纪要……如今我自己也过了退休年龄,但想到万书记和父亲他们那代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神,我仍有理由感到年轻,仍然还需努力,人生不能停止脚步。

真情

关于父亲的点滴记忆

旭宁

父亲三十岁以后,我才从一个偏僻的乡村小屋告别童年,与他团聚,住到同一个屋檐下。

当时家里住杉木塘,紧邻铁路,父亲上班的地方在清水塘,两地相距十多里路。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地骑一辆大钢圈的回永久牌自行车,风尘仆仆地来来往往,那辆自行车因为生锈而发出特有的铃声,总是每天提醒我的黎明。

我曾经有两次坐公交车去找父亲,有次中途车在清水塘站提前下车,路边那泛着清波长满菱角的水塘里有满眼的嫩绿。父亲上班的地点必须经过清水塘再往前到水泥厂,是9路公交车的终点站。水泥厂里到处都是厚厚的灰尘,当时他戴着纱布口罩,顶着一头“灰白的头发”,见过我后,就匆匆走了“车回”。

不上班的周末,父亲会将时间安排得非常充实。那时每家每户都配发粮证、煤证、布票、肉票、粉丝票、豆制品票……父亲是一家之主,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父亲口袋里揣着这些票证,盘算着家庭成员的温饱。我随着他先后进粮店、菜店排队购物,然后再跟在他的身后扛着长长的水勺去菜地浇水,摘辣椒南瓜,挖成熟的芋头。那个时候我偶尔偷懒,会趁着蜻蜓正在竹篱笆的丝瓜架上歇息,屏住气息去捉住,然后又将它们放进松散的粪筐里。

为了解决好温饱问题,父亲自己挑砖砌了一口带宽灶的土灶,做饭的同时可以烧好热水,我放学后也会经常去厂里的木工房找剩余的刨木花等废料做柴火。我

偶尔跟着他学做藕煤——他用自己在工厂学的手艺做了一个藕煤模子,然后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弓着腰拉回来一车一车的煤,再按一定的比例掺上黄泥,加水“和熟”,拍实压紧,让它们“晒”一个晚上的月亮,使煤和黄泥充分地相吸相粘,第二天清早他一起床就开始做藕煤。父亲做的藕煤非常专业,藕煤的每个孔他都要我检查是否通透,我看着他衣服汗湿了,换过汗衫,又湿了,然后,他干脆光着膀子,脖子上搭一条毛巾擦汗。

每年山上的松针透熟飘落之后,阳光温热,父亲便提一个大竹篮,带着我们一起上山采松菌。黄褐色或者蓝绿色的松菌大小不一地撑着伞盖,躲在松针下或松木的芽草丛中,深藏着它们淡淡的草木清香。父亲找到了,就会欣喜大声地喊我们去看。有次他发现了一丛松菌,兴高采烈地去采,却发现一条蛇正抬头目不转睛地瞪着他,他又急又怕,连喊了几声“有蛇!”吓得我转身就跑,在山坡上慌乱地上蹿下跳。

父亲说,有松菌的地方曾经来过一种鸟,叫雁鹅鸟,雁鹅鸟在空中飞过,中途会在松树上停歇,鸟停歇过的树下就会长出松菌,也叫雁鹅菌,或者寒菌。每年采完松菌回来,晚餐时他都会端出一大锅鲜美的寒菌炖肉。

父亲“入得厨房”,做的菜极具家乡特色。我至今遗憾没有跟父亲学会做酥肉,他做的时候用糯米、桃酥、鸡蛋、糖、五香粉、五花肉等原材料,先后加工搅拌均匀,热油下锅炸至金黄松软,我只要看见了

就忍不住直接用手抓起来大快朵颐。

父亲曾断断续续读过几年私塾,但他嗓门高,性格急躁,很少循循善诱,他直接将“竹梢子”(竹枝条)扎成的“棍棒”放在老式架床的床顶,依仗着个子高的优势可以随时取下来实施“家法”。他制定了很多家规,包括不准打牌、不准跳舞、不准看电视、不准讲粗话,要洗衣做饭等等,如果我不小心触犯了,他都会板着脸,不情不愿却又无可奈何地伸出双手。他使用“家规”的时候,还有一个苛刻的附加条件,就是不许其他任何人求情或者插话——他的大嗓门只要一放开,家里大大小小立马悄无声息,唯若寒蝉。

从到城里开始,我就惧怕父亲,自幼不在父母身边生活,我自带了一种胆怯和疏离,害怕被“寄人篱下”,同时畏惧父亲的性格脾气,有次父亲在家里粗声大气地吼一嗓子,我即刻吓得“躲”到门后或者屋角里,恨不能马上钻进墙缝。

日子就在父亲的严厉和粗声大气中平淡淡淡地日月升落。

父亲有段时间换了工作,负责一个小小的电镀厂,为指甲钳、落地台灯、螺帽等产品“涂脂抹粉”电镀铬或镀锌,然后再让它们走向四面八方。厂里离家很近,因此,我在家里时不时都能听见父亲在外面的喧哗。后来,父亲又调整了工作,到了一个山清水秀花红草绿的地方,这时父亲的脾气性格有了明显的改变——公园里

有鹿圈,养有一些梅花鹿、马鹿,他时不时会散步过去看望它们,还给它喂秋天成熟的食物。